

「泛珠三角」与南海贸易

主编：叶显恩 谢鹏飞 林有能

香港出版社

「泛珠三角」与南海贸易

主编：叶显恩 谢鹏飞 林有能

香港出版社

翻
印
必
究



版
權
所
有

“泛珠三角”与南海贸易

主编：叶显恩 谢鹏飞 林有能

出版发行：香港出版社

Hong Kong Publishing

19A Shining Building

481 Joffe Road Hong Kong

网址：Http: //www.hkpublishing.com.hk

电话：21161998

传真：21161988

开本：850x1 168 1 / 16

印张：26.875

字数：424千字

印数：1-1000册

版次：2009年5月第一版

国际书号：ISBN 978-988-17190-8-9

定价：30.00元

历史传统与现代化：

“泛珠三角”与南海贸易学术研讨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
民族与宗教研究所
联合研究中心



历史传统与现代化：“泛珠三角”与南海贸易学术研讨会合影留念

2004.7.16肇庆

CONTENTS

目 录

- 1 / 叶显恩 十八世纪商业扩张时代的南海贸易与广州
- 17 / 韦庆远 晚清华工出洋与澳门的“苦力贸易”
- 44 / 耿 昇 清代西方人视野中的澳门与广州
- 63 / 黄启臣 广东在贸易全球化阶段的中心市场地位
——16世纪中叶至19世纪初叶
- 71 / 郑培凯 《陶瓷下西洋》计划介绍
- 74 / 司徒尚纪 许桂灵 泛珠江三角洲古代文化、交流和融合刍议
- 100 / 徐晓望 明代韩江与汀江流域的区域市场
- 128 / 方利山 明清徽商在粤闽
- 139 / 李庆新 海外贸易与珠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变迁(1550-1640年)
- 174 / 周伟民 唐玲玲 宋代南海香料贸易与海南经济社会发展
- 190 / 潘 安 十七至十八世纪越南南方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关系
- 196 / 施存龙 珠江口古代外贸港屯门和赤湾新辨
- 212 / 陈红莲 17世纪至今中国与越南的信仰和宗教的交流
- 217 / 邱淑如 林 舟 越南华人会馆和庙宇之旅与后现代世界
- 222 / 冷 东 东南亚海外潮人与德教的传播
- 237 / 何思兵 旗昌洋行与美国对广州早期贸易(1818-1844年)

269 / 赵立人	电白古港钩沉 ——兼谈明代的海丰港
274 / 刘正刚	清代“泛珠三角”地区的粤商
290 / 彭世奖	从《茶务彙戴》的发现谈广东茶工、茶商对世界茶业发展的贡献
293 / 程存洁	珠江江城风情历史画卷考
303 / 王杰 李振武	析传统商业文明的盛衰 ——以朱广兰企业为例
313 / 冼剑民	清代广州城郊农业的模式与演进
330 / 房学嘉	墟市与地方文化的互动关系:以梅县松口镇为重点研究
342 / 吴建新	抗战前广东蚕业复兴运动与蚕丝业的近代转型
356 / 高凯	论秦代被谪戍岭南商人对中原商业经济意识的传播与影响
367 / 王恩重	十七世纪台湾郑氏海商集团在中国社会经济史上的地位
381 / 徐松荣	清末民初华侨在广东的交通建设与商贸活动
391 / 胡文中	从詹天佑家谱看清代“泛珠三角”与南海贸易
398 / 刘伟铿	肇庆在泛珠三角经济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及其现代化取向
405 / 周晓辉 莫春香	陈宜禧对新宁铁路的修建与经营
416 / 张金超 李红伟	张弼士实业成功之道略论
425 /	后记

十八世纪商业扩张时代的南海贸易与广州

叶显恩

由于15世纪末，新大陆的发现和东方航线的开通，揭开了海洋时代的序幕。16世纪，随着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西方殖民海商的东来，传统南海^①水域的贸易网络，已经西越印度洋，延及大西洋，东通太平洋彼岸的美洲新大陆，初步形成世界性的海洋贸易圈。

如果说16世纪是世界性海洋贸易圈形成的时代，那么18世纪则是全球化商业扩张的时代。继葡、西、荷东来之后，英、法、丹麦、瑞典，以及美国等新旧大陆国家，也自17世纪起，先后涉足南海水域进行商业扩张。18世纪是一个商业竞争趋向激烈的时代。这一世界贸易新格局的出现，对于作为传统海贸中心的广州，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本文的主旨在于探讨在全球化商业扩张时代形势下，南海贸易格局的变化，以及广州贸易所作的回应。

一、南海贸易格局的变化

广州古来就是中国海贸的中心（除元代一度为泉州所取代外）。明代于宁波、泉州和广州分别设置市舶提举司。明确指定宁波通日本，泉州通流求，广州通占城、暹罗和西洋诸国。就是说，广州被指定为南海各国朝贡贸易的港口，所管辖的范围也最为广阔。南海贸易局势的变化与广州贸易息息相关。探讨广州贸易时，应当从南海贸易谈起。

环列南海的东南亚各国，历来就间断地、经常地向中国朝贡。有些地方如北越就是中国的郡县。中国的古文献上称东南亚各国为“南海诸蕃国”。这些王国被视

为藩属而负有朝贡的义务。中国自中唐起,中西交通以海上为主,海洋的发展逐渐受到重视。从南宋赵汝适的《诸蕃志》和元代汪大渊的《岛夷志略》看,中国海洋贸易网络已分布在南海水域各地,和印度洋、阿拉伯海、波斯湾、红海沿岸的南亚、中东和东非等地。明初的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不仅续了元代的余绪,而且把发展海洋推向巅峰。就当时世界海洋贸易的大势看,中国居于领先的地位。这是中国的大航海时代。遗憾的是自此之后,明皇朝不仅没有后续的举动,而且明帝国的影响力已龟缩回南海范围之内。

明代,对南海地区的宗藩关系趋向制度化:册封与朝贡都立有规章,有行人司、会同馆等部门专管。永乐年间(1403-1424年),就曾经赐予满刺加、浣泥、柯枝和日本四国以镇国山碑铭,作为藩属的标志。明中叶以降,朝贡贸易衰落,官方的市舶贸易已经不能满足中国与南海诸蕃国的需求,私人海上贸易(走私贸易)勃兴。南海地区,自宋元以来,尤其郑和下西洋期间,已为华人所不断移居,此时更成为中国商民出没的地方。往往有侨居不归,至长子孙者。当地的华侨取得南洋经济上的领袖之地位,同时参加政治,有为当地执政者,乃至为国王者。社会文化有汉化的倾向。北婆罗洲有自称为中国人之苗裔,采用中国之耕织法。菲律宾由游牧时代进入农业时代,是由闽人林旺之启导。不少地名也中国化。^②明中叶,华人在马尼拉已有超过1万人居住。^③华侨在东南亚占据着绝对的优势。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海商于16世纪先后前来,改变了南海政治与贸易的局势。

首先,中国与南海诸蕃国间传统的政治上的“宗藩关系”和华商的贸易网络受到冲击、削弱和破坏。葡人于1511年攻占满刺加(今马来西亚,明末称麻六甲),是西方势力东渐的滥觞,也是宗藩关系受到冲击和破坏的开始。作为明帝国的藩属国满刺加,陷落达十年之久,明朝廷才得知。明帝国也曾严词申斥葡人,责令其退出,返回故土,并下诏谕近邻暹罗(今泰国)诸夷救援,但未曾取得任何效果。从此,明帝国与南海诸蕃的宗藩关系日渐式微,在南海的政治势力逐渐退出。尔后南海诸藩先后陷为西方的殖民地。

满刺加为葡人占据之后,便切断了与明帝国的关系。满刺加海峡是南海通往印度洋的咽喉。葡人据此控制了欧洲与东亚的贸易。原流寓马来半岛的华商,基于满刺加为葡人所占夺,出于无奈,纷纷转往东南亚其他地方从事商贩。一些地方如哑齐(苏门答拉)等因华商的转来而兴盛起来。

葡人继而前来中国沿海活动。先是勾同中国的海商、南海诸蕃的一些商人在杭州湾外的双屿岛建立国际性的市场（1548年明朱纨发兵捣毁），继而以租借占据澳门作贸易据点，并建立东亚与欧洲的贸易网络。

继葡人之后，西班牙人于16世纪中叶占据菲律宾，以马尼拉为贸易基地。16世纪末，荷兰（16世纪时其领土包含今日的比利时、尼德兰、卢森堡和法国北部法兰德斯一带）也来到吕宋（菲律宾），由于遭到对手葡、西的抵制，于是荷兰国内的各公司联合起来，组成荷兰东印度公司，并配有强大的武装舰队，以加强其在南海的竞争力。它极力排斥葡、西势力，甚至进攻其贸易殖民基地。17世纪初营建巴达维亚城（雅加达），作为殖民统治的据点。继而侵占锡兰，并从葡人手中夺取麻六甲，又占据台湾，以大员（即今安平）作为贸易据点（1662年为郑成功所驱逐，收复台湾）。巴达维亚和大员两据点形成犄角之势，相互奥援。继葡萄牙人之后称雄于东亚海域。

英国1600年组织的东印度公司，也前来加入南海水域的商战。由于其资本和武装力量皆不及荷兰东印度公司，不能与之相抗衡。1613年开设在日本平户的商馆，因经营不善，也于1623年关闭。在17世纪20年代，把重点转移到印度和波斯。唯留下爪哇的万丹作为在南海的基地。

前来南海水域的葡、西、荷和英等国的贸易公司，不仅拥有以先进的技术武装起来的舰队，而且有本国政府作其政治与经济的坚强的后盾，有垄断某一地区贸易的特许状，甚至享有殖民地军事和政治的全权。他们凭借其船坚炮利，一方面主张公平的贸易，另方面遇到失利时，则拦截掠夺海上商船，甚至烧杀掳掠沿海居民，无恶不作。他们在南海地区建立起各自的殖民基地，实行殖民统治，一改东亚海域由华商独领风骚的传统贸易局势。在荷兰、西班牙所建立的据点及其控制的地区，凭其武装舰船的优势而独占贸易，还对华商征税。例如，凡到由荷、英控制的旧港和占碑的船只，必须取得他们颁发的许可证；规定采购胡椒的数额，还要征收人头税。^④在这些地区，华商受制于西人，有时为西人作短程运输，陷入附庸。即便在这种情况下，华商仍然不屈不挠，采取化整为零、化零为整、“萍聚雾散”等方法，勉力抗衡。^⑤其次，西方各国海商的先后到来，导致出现中西两半球海商直接交遇的新局面。此时南海贸易的网络，既连结太平洋彼岸的南美洲，又重新伸展到永乐之后中断往来的印度洋，并扩大西洋，初步形成横跨亚、非、欧、美四大洲的世界

性海洋贸易圈。我们看到，中国商品供应的多寡，直接影响到其他地方。例如，中国的生丝供应不足，便直接影响墨西哥的丝织业。中国于1639年因台风，甘蔗受损，糖产量下降。驻台湾的荷兰代表给巴达维亚总部报告说，“您那里以及波斯均不会获得所需的糖量。”彼此间都需要交换各自的产品。荷兰人说的：“中国人需要我们的白银，正如我们不能没有他们的商品一样。”^⑥可以说，16、17世纪的世界已经开始趋向一体化。

如果说16世纪是海洋时代，世界趋向一体化的开端，那么，18世纪是全球商业扩张的时代，也是世界一体化加深而出现的贸易重新改组的时代。

18世纪全球商业扩张时代，是伴随着西方产业革命的兴起和取得成功而出现的。产业革命为市场制造了愈来愈多的产品，迫切需要推向市场。从英国1700年至1800年一百年间的出口商船吨数、输入额和输出额成倍地增加中，可以看到产业革命带来的后果——工业产品对市场需求的迫切性。据统计，离开英国港口的商船吨数，1700年为31万多吨，1800年增达192万多吨，增加了五倍多；商品输出额，18世纪的首10年，为600至700万磅，1800年却达到4187万多磅，增了约6倍；商品输入额，18世纪初为400万磅，世纪末已增达约3千万磅，增加了6倍多。如果置于坐标图上，可以看出，这三项指标都在扶摇向上，世纪末的20年间更是几乎直线上升。^⑦18世纪的南海贸易，除老牌的葡、西、荷等国商人相互竞争外，又增添了英商这一强劲的对手。跟踪而来的还有欧美其他国家的商人，如法国、丹麦、瑞典和刚刚建国的美国等。此时，南海市场的竞争越发激烈化，而且更加带有疯狂性与倾轧性。

商业是以国家的实力为后盾的。国家实力的消长，直接影响商业的竞争力。自重商主义流行以来，商业扩张的胜利就是市场、资本和政治权力结盟成功的结果。商业资本的张缩是与其国家权力的兴衰联系一起的。对此，近来已有学者作过专门的研究。^⑧从西方各国海商在南海势力的消长与其国家实力的隆替相一致，也支持了这一观点。取得产业革命成功的英国日益强大，其在南海贸易的地位也随之而与日俱增。英国东印度公司早在创立伊始，就以印度为掠夺对象进行蚕食。18世纪30年代起占据了马德拉斯等三个管区，并在其他地区建立了商栈。18世纪末，印度终沦为英国的殖民地。有了印度作基地，更可以加强对南海水域作掠夺性的贸易活动。1756年，英商的通译员洪任辉（James Flint）秉承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旨意，乘武装

船闯入宁波、定海和天津等港口，提出诸多横蛮无理的要求。基于历史上“双屿岛”与“澳门”由洋人引诱而聚集成市的历史教训，洪任辉的举动引起了清朝廷的警惕。为了“防微杜渐”，又顾及广州僻处南疆，其出海孔道的黄埔、虎门，“在在设有官兵”，可以保证安全，所以于次年，亦即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下诏令：“将来止许在广州收舶交易。”^⑩从此，只允许欧美各国商人在广州一个口岸通商，不准再往其他三口（厦门、宁波、上海）从事商业活动。这就是大家所熟悉的规定广州为“独口通商口岸”的由来。

二、“独口通商”与广州贸易

广州被指定为中西贸易的独口通商口岸的由来，已简述如前。此事常为中外学人所称引，几乎已经成为常识。引述太多，有时望文生义，以为其他口岸都关闭了，或认为东亚各国也一样止许来广州口岸通商。其实，独口通商仅限于对欧美各国商人而言，并不禁止他们在南海地区殖民地的商人前往厦门、宁波和上海等口岸贸易。事实上厦门、漳州、上海、宁波和镇海等港口，在广州被规定为独口通商之后，一直接待来自吕宋、爪哇、苏禄和暹罗的商船。甚至一些欧洲人还在广州之外的其他港口继续进行贸易，西班牙人就被允许在厦门贸易。英国等欧洲船只只要悬挂葡萄牙的旗帜，也可以在对之关闭的港口停泊。英国的散商（非属东印度公司的民间商人，嘉庆年间官方文献对音译作“港脚商人”），与广州的华商合作，便利用西班牙的旗号于厦门从事商业。西班牙公司的合伙人詹姆斯·马西森（James Matheson），于19世纪前数十年中，便在厦门经营与马尼拉之间的定期贸易。

关于“独口通商”规定的利弊及其后果，尚待深入的研究。但有一点是明显的，即对广州贸易带来了空前的繁荣。中西间的贸易，原主要是在南海区域内西方各国的殖民地或商业据点进行的；实行“独口通商”后的广州，成为中西直接贸易的市场。中西贸易也从原来的以间接贸易为主转为直接贸易为主了。

独口通商给广州带来繁荣的一个明显的证据，是各国来船显著地增多。据文献记载，在独口通商前10年，每年平均约近20艘，尔后不断上升。1833年竟达189艘。据统计，自1759年至1833年共来船5072艘，平均每年达67.6艘。^⑪

18世纪80年代以后，就中西贸易而言，主要对手是英国（包含其殖民地印

度)。早在18世纪初,以开拓毛织品市场为主要职责的英东印度公司船舶,每年往返于中国东南沿岸港口。广州被确定为中西贸易独口通商口岸的第3年(1759年)之后,英东印度公司每年来船约10艘左右,1770年以后有时增至20艘上下,1786年激增至62艘,1883年达107艘,其中港脚商人(散商)船82艘。美国虽然姗姗来迟,但其来船之多却仅次于英国,跃居第二位。现以1833年为例,将西方各国来船只数和吨数列表如表1。中英间的贸易:输往英国的商品占总出口额的70%左右,从英国进口的商品占总入口额的80-90%。据1833年在伦敦的东印度公司的听证会记录:英属殖民地印度和中国之间的贸易总额为3200万美元,而中国和英国之间的贸易是1100万美元。另据同时代人菲普斯(Phipps)估计,认为中国与英国贸易达4445万美元,英属印度和中国间的贸易为2743多万美元。^①两者说法,对贸易额的估计差距甚巨,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英国本土没有足够的让中国接受的商品与中国交换,只有以其殖民地印度的产品来与中国作三角贸易,而且以印度产品为主。

表1 1833年,在广州的外国船运情况

国别	只数	吨数
英国公司	25	28,167
港脚(散商)	82	36,326
美国	59	24,000
荷兰	8	3,200
法国	7	2,800
丹麦	4	1,600
比利时	1	400
普鲁士	1	400
汉堡	1	400
墨西哥	1	400
总数	189	97,693

资料来源:Sucheta Mazumdar(穆素洁),*Sugar And Society In China, Peasants, Technology And The World Market*, Published by th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and distribut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88.

其次,广州出口产品多样化,增多商品种类,虽然不乏地方性的特产,但更多更大量的是普通的农产品。种类达80多种,其中以茶、生丝、绸缎、土布、糖等为主。从中国传往欧洲的饮茶风气,到18世纪已经养成习惯。从18世纪20年代起,

茶叶已取代传统的商品丝货的地位，成为贸易额最大的单项商品。18 世纪 80 年代，茶又成为美国的重要饮料，其需求量益增，需求量更大。我们从表 2 可以看出 18 世纪 80 年代、90 年代和 19 世纪 30 年代广州出口贸易的大致情形。值得注意的是土布（又称南京布）和食糖在 18、19 世纪之交以后，日显重要。从与英国的贸易看，土布的贸易额有不断上升的趋势。糖和糖制品也成为中国出口到英属印度市场的主要商品，早在 1716 年，马博罗（Marlborough）号船货的清单，糖和糖制品是主要的商品。前往印度的船只除载有数十万磅的中国糖（在大多数船的载量平均为 400,000 磅至 800,000 磅之间）之外，还装载有铜器、白铜（在印度用于铸造船的一种铜、锌和镍的合金）、水银和明矾。至 1833 年，糖占贸易总额将近 1/4。^⑫

各国用来与中国交换的产品主要是棉花，尤其是英属印度产的棉花。其次是英国的毛织品和其它工业产品。18 世纪，广州贸易处于出超，各国的补偿物是白银。英国运来的毛织品赚不到什么钱，有时甚至亏本。但却可从出口棉花等得到盈利。例如，1796 年，从伦敦来船 18 艘，运来毛织品成本价 612464 磅，售得款 1666602 两，亏损 9.3%；运来的棉花 5589 担，成本 103968 卢比，售得款 69858 两，盈利 105.3%；同时运来银元 120960 两，以作其入超的补偿。这一年，美国和丹麦的船只，除运来广州“微不足道”的货物外，差不多都是用白银补偿。两艘丹麦船运来的白银为 650000 元。^⑬据估计，从 1784 年至 1844 年间，美国商人把约有 15 亿美元到 18 亿美元的银币带到中国。这有助于扩展国际的金融市场。18 世纪中叶，鸦片贸易日益增长，且迅速扩展，各国来船尤其英船，往往夹带鸦片毒品来广州贩卖，19 世纪后，数量剧增。据 1818 至 1827 年的统计，运进的鸦片已达 6926 箱，价值 78224871 元。^⑭各进口的货物，以 1833 年为例，详见表 3。

表 2 广州出口贸易举例

	船 只	1776 年		船 只	1795 年			船 只	1832 年			
		茶叶 (担)	生丝 (担)		茶叶 (担)	生丝 (担)	土布 (匹)		茶叶 (元)	丝货 (元)	土布 (元)	食糖 (元)
英国公司	8	41820	?	16	112840	711	80000	23	8017810	—	—	—
散商	16	731	965	17	1814	460	45000	67	795361	2401936	85050	221885
法国	5	42893	576									
荷兰	4	36427	259									
瑞典	2	22868	16	10	20699	—	45000					

丹麦	3	18730	45										
美国	—	—	—	10	21147	—	685000	62	5925541	166137	30775	42300	
其他国家								21	50300	22800	13000	264185	

资料来源：马士著，区宗华译：《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

表3 1831年广州进口贸易情况

价值（元）

货物	英 国			美国	其它国家	总计
	公司	散商(港脚)	总计			
毛织品	2130638	220783	2251421	144440		
棉制品	273681	227043	500724	483382		
五金	195047	106979	302026	958575(1)		
毛皮				166736		
其它西方产品	—	25229	25229	177010(2)		
西方产品小计	2599366	580034	3179400	1930143		5109543
棉花	1088308	3842935	4931243	1890		
鸦片		11304018	11304018	221100	1497585	
檀香木		74471	74471	7000		
锡箔		85544	85544	17152		
胡椒		110397	110397			
其它东方产品	—	835154	835154	206400		
东方产品小计	1088308	16252519	17340827	453542	1497585	19291954
进口产品总计	3687674	16832553	20520227	2383685	1497585	24401497
进口白银	—	16000	16000	667252(3)	—	683252
进口货总计	3687674	16848553	20536227	3050937	1497585(4)	25084749

原注：(1) 包括水银 10295 担，720650 元。(2) 包括人参 2698 担，159550 元。(3) 另有 24801871 票据。(4) 属葡萄牙的。

资料来源：马士著，区宗华译：《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4卷，第285页。

这里应当指出，本文引用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的资料中，关于英国方面是相对比较可信，因为他是根据当时的档案编著的。但对其它国家的资料，马士只据自英国公司的记录为限，很可能是不完整的；再是英国散商的资料，也同样存在这一问题。

除中西贸易集中在广州以外，逐渐陷入西方殖民地的南海地区各国的商人，也来广州贸易。据 1833 年在伦敦的东印度公司的听证会记录，中国对东南亚和日本的帆船贸易估计每年的总额是令人印象深刻的 7000 万至 8000 万美元。^⑤这一贸易额几乎相当于中英贸易的两倍。可以想象其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属广州贸易的。

广州的贸易是在清政府制定的体制下进行的：由粤海关负责税收并管理行商，

指定黄埔为外国商船的停泊所，澳门为各国商人的共同居留地，广州十三行负责中外贸易并管理约束外商。这四个环节，又各自形成一套制度。目的是以官制商，以商制夷，确保税收。广州十三行是广州外贸体制中的重要环节。它原是广东巡抚李士桢在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在广州设立专营“外洋贩来货物及出口贸易货物”的洋货行。有学者认为广州十三行的名称于晚明已经出现，清代的十三行源自于此。^⑥充当广州十三行商者，需经政府特许并颁发执照。他们各自经营，难免出现彼此间的矛盾和倾轧。为了协调行内关系及处理行外事宜，以加强共同对外竞争力，于1720年成立公行。公行的成立被认为伤害了外商的利益，因而遭到英商的百般阻挠和要挟。次年于无形中宣告终止。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清朝廷允准行商潘振承等9家呈请，重建公行。嗣后分设外洋、本港、福潮三个名目，以分别办理欧洲、南洋以及福州、潮州贸易、货税事宜。这样负责办理欧洲贸易、货税事宜的外洋行（即十三行），便成为垄断广州中西贸易的外贸机构。

应当指出，广州贸易的繁荣，是以牺牲沿海各港口的贸易作为代价取得的。我们不能以此推论当时整个中国外贸的发展程度。中国各地的产品不能就近运往便捷的港口，而必须远途跋涉运来广州，增加了商品的运输费用。从全局看，显然有损于中国经济的发展。但是，毫无疑义，独口通商给广州带来的商业繁荣，对岭南经济的发展是十分有利的。尤其强烈刺激了珠江三角洲的经济。正是这一期间，珠江三角洲由于广州市场的需求而不断加深其商业化，从而跃居中国先进经济区的行列。各地通往广州商路沿边的市镇，也于此时勃兴。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中西贸易的唯一口岸广州的商业，带来了西方商业的经营理念与管理方法，诸如理性主义、“有限负债责任（limited liability）”观念、复式会计法，等等。再是通过承充行商、买办等角色，培养出一批熟悉近代商业的人才，推动了中国商业的近代化。19世纪60年代，基于国内尚无以华商的名义自行投资的规章和经营环境，所以尽管以华商投资为主创办的公司，也不得不以外商之名注册挂牌。在上海的公正轮船公司即一例。它本来是由著名的广东香山买办唐廷枢、郑观应和郭甘章等共同筹办的。还有值得注意的是，出现了一批能与西商进行商战的如同我们下面将要谈及的豪商。他们长袖善舞，在与西商的竞争中不断增殖资本，并将其贸易网络伸展到欧美各地。

三、广州华商资本的发展与卷入世界市场

在 1750—1840 年的世界商业扩张时代,大量的英国、美国和其他国家商人的到来,并没有把广州的华商挤垮,反而造就了广州十三行商人商业资本的黄金时代。广州十三行商人(亦称行商、中介商)是政府特许的商人,又往往通过捐纳而取得虚职官衔。因此,一般也叫他们为官商。他们介乎外商、华商和官府三角关系中,不仅享有特殊的社会身份地位,而且垄断着对外贸易。他们除包揽对外贸易外,负责把外商进口货税在洋船出口时亲自赴海关缴纳,以防止税收人员从中勒索;负有管理、保护外商之责;居间办理广州官府与外商交涉、往来文件等事务,俨然兼办洋务了。他们垄断对外贸易,意味着垄断货源、垄断价格(名义上是广州的官员定价,由他们出面宣布)、垄断利润。所以,行商往往短期内即可暴富。据怡和行商人伍秉鉴在道光十四年(1834 年)自己统计,所有田地、房屋、铺店、钱庄,以及与英美两国贸易的商业资本共达 2600 万两。又据咸丰十年(1860 年)法国一家杂志的记载,同孚行商人潘正炜的家产总额也达 1 亿法郎以上,其财产已富于一国王之地产。^①行商这一商人集团继徽商、晋商之后称雄商界,其商业资本额也远超过徽、晋商。^②如果说徽、晋两大商人集团在明清时期,只涉足于东亚海域各国的话,那么,以广州行商为代表的商人于晚清已经走向世界,前往欧美作商业扩张了。

广州豪商的出现,是与世界商业扩张时代提供的舞台有密切联系。西欧各国原以享有垄断特权的东印度公司的名义在亚洲和广州市场出现的。18 世纪出现了众多的散商(港脚商人),他们是一批在广州市场上越来越活跃的自由商人。1784 年美国商人的到来,以及 1834 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垄断特权的取消,更增添了商业自由竞争的活力。自由竞争不断地取代垄断,有利于商人精英脱颖而出。广州华人豪商如潘氏、伍氏等,就是在这一形势下出现的。

广州华商的经营活动,因国内资料的阙如,有许多商情一直沉埋在黑暗之中。随着荷兰、丹麦、瑞典、印度和美国等国家档案的发现、整理和利用,其鲜为人知的史实慢慢地浮出水面。据西方学者的研究,18 世纪,广州华商已经经营广州与欧洲间货运的帆船贸易。据荷兰和瑞典有关 1750 年至 1770 年广州帆船贸易的档案记录,至少有 27 艘,多达 37 艘的中国帆船经常出入于广州。投资于这一帆船贸易的

有广州十三行商人，也有外国商人。据瑞典档案记载，在 37 艘帆船中，有不少于 9 个华人商号和 13 个华商所投资。另外还有 7 位充当管理者。有的帆船是属于十三行商人所拥有，如潘振承、颜瑛舍、陈捷官等。帆船的货仓，往往为外商所租用。根据美国学者范达克（Paul A. Van Dyke）博士以 1763 年为例所作的估算，广州帆船所承担的广州对外贸易货运量已占总量的 30%，约略与英国的货运量相等，余下的 40% 由各国来广州的货船分担。由此可见，广州帆船货运在当时世界船运中的地位。

以行商为代表的广州豪商，已如同其印度、美国商人伙伴一样，成为国际性的商人。华商以输出中国的茶叶、棉、丝、糖等商品，而同各国的国际商人连结一起。同时利用他们的关系在亚洲以外的地区营运其商业资本。

18 世纪中叶，广州十三行的主要商人之一同文行潘振承（1714 - 1788 年），已经与英国东印度公司发生贸易关系。他本人曾几次马尼拉之行，并能用英语与西班牙语洽谈生意。他在东南亚其他港口也有贸易关系。早在 1753 年，潘振承已经与东印度公司发生贸易往来，在 18 世纪 70 年代开始投资于瑞典东印度公司。在这国际贸易关系中，瑞典的铜、铁和木材产品被销售，以换取在加地斯（西班牙西南部之一海港）的西班牙银，这些银后来流入广州。他与西班牙人也有过密切的合作联系。他死后其子继承了约 2 千万西班牙银元的财产。

19 世纪初，丽泉行商潘长耀（1759 - 1823 年）租用美国的货船来进行贩运货物。中国和外国商人都因期货交易体系中资产流动问题遭受过损失。许多美国商人因营运的需要而向中国人大量借钱。潘长耀是其债主之一。美商借债逾期不还。单在费城，便有 21 名商人欠他的债款达 50 万美元。为此，潘长耀在 1815 年曾写信给美国麦迪生总统，抱怨美国商人欠他 100 万美元还没有偿还。在那个时代，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伍秉鉴（1769 - 1843 年）是 19 世纪最著名的广州十三行商人。他不仅通过充当美国人的代理商销售中国和欧洲的商品，而且仰仗他与各国商人的关系，建立起其庞大的世界性商业网络。

美国学者穆素洁博士根据伍秉鉴写给他美国经理人的 50 多封信件（这些信件藏在哈佛大学贝克尔图书馆），以及他写给与之有密切商业联系的印度帕史（Parsee）商人詹姆塞特吉·吉吉博伊（Jamsetjee Jeejeebhoy）的信件（藏于孟买的 Maharashtra 邦档案馆），并参照其他文献资料，在她的近著《世界市场与中国蔗糖业》